

儒家

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rujia jieshixue de chansheng yu fazhan

康宇◇著

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儒家

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rujia jieshixue de chansheng yu fazhan

康宇◇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 康宇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 - 7 - 81129 - 486 - 6

I. ①儒… II. ①康… III. ①儒家 - 阐释学 - 研究
IV. ①B222.05②B0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9696 号

儒家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RUJIA JIESHIXUE DE CHANSHENG YU FAZHAN

康 宇 著

责任编辑 杜红艳 曲丹丹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14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486 - 6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核心概念解析	3
三、儒家早期经典的形成与解释学的萌生	7
四、儒家解释学的内容体例	12
五、儒家解释学的基本特征	15
第一章 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兴起	20
一、孔子的贡献	20
二、子夏的探索	26
三、孟子的理论	30
四、荀子的论述	37
五、《易传》的大成	41
六、其他成就	46
第二章 两汉：儒家解释学的兴盛	50
一、汉初儒学的复兴	50
二、今文经学的形成	54
三、今、古文经学之争	61
四、古文经学的势强	66

五、汉末儒家解释学的统一	74
第三章 魏晋隋唐：儒家解释学的转变	79
一、郑王之争与儒学式微	79
二、魏晋《论语》学的发展	83
三、解释学在南北朝的分立	94
四、隋与唐初经典解释思想的统一	102
五、中唐之后的解释学新风	109
第四章 宋元明：儒家解释学的创新	121
一、宋代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建构	121
二、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	132
三、明代的“心学”解释学	147
第五章 清代：儒家解释学的重建	169
一、“朴学”与清前期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建	169
二、汉学、宋学之争	187
三、今文经学的复兴与解释学异端的出现	193
第六章 民国：儒家解释学的跃迁	205
一、新考据派的形成	205
二、唯物史观派视域中的儒家经典解释	217
三、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体悟解经之路	223
第七章 现当代：儒家解释学的命运	237
一、港台新儒家对于经典的现代解释	238
二、海外新儒家的解释学思想	249
三、大陆儒家解释学的发展	256
四、对现当代儒家解释学发展的反思与追问	263
余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267
后 记	281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儒家解释学是对儒家经典进行说明、解释、理解和创新的学问。从先秦时期的孔子删定“六经”，并对之注解、诠释之后，历代儒家均以解释前代经典为己任，而他们解经的成果往往又成为新的经典，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新的解释对象与解释空间。可以这样认为，儒家解释学与儒学史的发展紧密相连，儒家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亦是经典解释的学问。

然而，若以西方流行的解释学理论与解释学方法论作为比对，儒家解释学的思维理路、方法范式、内容体例、解释问题等似乎与之格格不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人对儒家解释学存在合法性的认同。但若将解释学界定为对文本“理解”学问的话，那么不同的国家，只要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本阅读、诠释方式，则必然会存在不同的解释学理论与方法。为了正确解释《圣经》与法律文本，西方诞生了古典解释学；为了将解释的方法与规则建构为一门科学的学问，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创造出西方现代解释学，其宗旨毫无例外地指向对语言与文本真谛的领悟与反思。儒家解释学在自身发展的两千年中，无论其解释重心怎样改变，

2 儒家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解释视角如何更新,“理解”始终是不变的主题。所以,尽管“解释学”一词出自西方,解释学作为一门学问源自德国的传统,但并不可由此推论,中国儒家文化中不存在一套有关文本理解的解释学学说;相反,实践证明在儒家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其蕴涵的有关语言与文本理解的学问,完全可以与西方解释学的精髓相媲美。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大批中国学者开始投身儒家解释学的研究。成中英、傅伟勋、黄俊杰、汤一介、景海峰、李翔海、刘耘华、李清良、周光庆、周裕锴等人,或以专著、论文的形式,或以主编刊物、文集的方法,将儒家解释学的研究推进至学术界研讨的焦点与热点。相应的成果不断涌现,学者们赋予了儒家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地位,规范与统一了儒家解释学研究范式,梳理与创新出儒家解释形上学、本体论、认识论等解释学理论,为中西解释学理论互相促进、融合,为儒家解释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研究中也出现一些遗憾,如过于注重个案研究,缺少宏观上、整体上的把握;还存在诸多研究领域中的空白,规范理论建构不完善,缺少中西解释学理论比较;在具体问题研究中缺少统一的解释学假设,解释方法日益呈现哲学化倾向,使得“解释”后的儒家经典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还有一些学者对儒家解释学本身存在“误解”,甚至只是简单地把它当做一门理解的“技艺学”,从而造成学问自身在发展中出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等等。

面对上述问题,对儒家解释学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以系统论、结构论、唯物史观为基础,详尽剖析并建构其内在结构、发展理路,揭示其理论范式,在中西比较、古今比较的基础上,为儒家解释学探寻现代进路等问题,便具有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多重意义。完善儒家解释学体系结构,丰富相应思想论说,也正是本书核心价值所在。

二、核心概念解析

对于儒家解释学的剖析离不开对其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正如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概念都是一个“意念图案”,与其他许许多多的概念相互关联着。^① 这些关联着的概念范畴在儒家解释学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儒”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一书,“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儒”最初指一种职业,是对那些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的称谓。随着时代的变迁,“儒”的含义不断复杂化、抽象化,“儒”的概念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乃是指知识阶层的士人,即所谓的“儒生”;狭义的“儒”,则是指以继承发展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为己任者,亦即历代的儒家的代表人物。本书研究的“儒”主要是在狭义的意义上进行的。

20 世纪初,章太炎对“儒”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系统的分类。他在《国故论衡·原儒》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题号由古今异”的著名历史见解,认为“儒”字的意义经历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缩小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他进一步将“儒”作为概念分为三类,即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所谓“达名之儒”,是指“儒”的普遍概念或称之为广义之儒。如许慎《说文解字》作:“儒,柔也。术士之称。”所谓“类名之儒”,是指“儒”的类概念。《周礼·天官》:“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这个“儒”是一种职业,是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教民者。所谓“私名之儒”是指“儒”的特殊概

① 柴文华:《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 页。

4 儒家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念、个体概念或称狭义之儒,特指儒家学派。刘歆在《七略》中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1934年,胡适作《说儒》一文考证了“儒”的历史渊源。他认为“儒”有两个意义:其一,“儒”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其二,“儒”是殷民族礼教的教士,他们在被周征服之后很困难的政治环境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殷人的衣冠。与之相对,郭沫若在日本《中华公论》创刊号上发表的《借问胡适》一文中指出,“‘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因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不是由于他们本是奴隶而习于服从的精神的柔,而是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①。古之人称“儒”,最初当是俗语而兼有轻蔑之意。1975年,徐仲舒在对甲骨文中“濡”的含义考证后认为,“濡”的本义是“儒”,它特指专门替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祀祖神、办理丧事、当司仪的殷民宗教职业者。

与热衷于对“儒”含义的争论不同,学者们对于“儒家”的界定基本趋于一致。“儒家”特指先秦时期由孔子所创立并延绵不绝,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学术群体或派别。“儒家”之名成于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儒家”称为儒者。《七略》中出现了“儒家者流”的说法。而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提出了“儒家”的范畴。现在,“儒家”、“儒者”、“儒士”等范畴经常通用,泛指儒家学者。儒家自产生之日便肩负着“以道得民”和“以道教民”(《周礼·太宰》)的历史重任,由于儒之言优而和,所以言能安人,能服人。这样,就不断有人加入到儒者队伍中来,夫子门徒转相师授,道圣人之经者代代

^① 赵吉惠:《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相传,便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儒家学派。^①

“经”的原意是纺织机上等列布设的纵向的绷紧的丝线(以供纬线穿梭交织),初字为“𦉰”。“𦉰”亦声,义为“绷直”、“笔直”、“僵直”,“经,织也。从系,𦉰声”(《说文解字·糸部》)。“经”与“纬”相对,“纬”为横向的丝线,由于织布是先有纵丝,后有横丝,故“纬”以“经”为纲,“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后来出现“经纬”一词,特指天地事物的“常道”。儒家以天地之常谓“经”,让“经”指代本派的经典,“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释名·释典艺》)。经典具有特定的权威性,在儒家典籍中有十三种文献取得了“经”的地位。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官学。唐代有“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为国家取士之用。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刻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四书》,并为官方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们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至此,“十三经”在儒学典籍中的受尊崇地位愈加深入人心。

“解释学”又称“释义学”。在西方,广义的“解释学”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狭义“解释学”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局部解释学泛指任何文本注释;一般解释学是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的一般方法论研究;哲学解释学有

^① 康宇:《儒家美德与当代社会》,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6 儒家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两种形式: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主要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文本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在中国,“解释学”专指训解、阐述和研究经典之学,其最重要的组成即是儒家解释学。

儒家解释学是儒家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系统研究、探讨的学问。它托身于传统的经学与训诂学,在近代之后又吸收、借鉴了大量西方解释学理论方法,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梳理、分析儒家经典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对经传文字、名物度数的训诂,对经传义理的阐释发挥,对经书的考据等。儒家解释学一方面是理解和解释儒家典籍文化的技艺之学,重点关注意义的解释方法论的建构、完善,重视文本论与目的论的建设,另一方面又是缔造文化精神的“意义”之学,经典解释的效果性为其最终旨趣。最早的儒家解释学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编辑《书》,删定《诗》,编订《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修订、编写了《春秋》,并提出“述而不作”的解释范式。后又有孟子、荀子等诸多儒家学者在好经术、尚礼中,对经典不断进行解释。西汉,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儒家解释学发展盛极一时。魏晋时期,儒家解释学开始“玄学化”,并在南北朝时,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后经唐、宋、明的发展,于清代中期完成了近代之前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建构。至民国,虽然大量的西学、政治运动取代了原来的解释学思想,使得儒家解释学的发展势能减弱,但在现代新儒家的努力下,相应成果依旧斐然。新中国成立后,港台与海外的儒家解释学发展迅速,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派。国内在改革开放后,儒家解释学研究方重新开启,学者在审视传统解释学内容的同时,力图以中国解释学的立场建构足以与西方价值对抗的中国价值,儒家解释学在体系的完备

性、方法论的科学化等层面上得到强有力的加深。

三、儒家早期经典的形成与解释学的萌生

儒家最早的经典是“六经”。在孔子之前,“六经”本是古代的史料,先王之政典,非儒家所专有。《诗》掌于太师,以文学艺术(包括诗歌、音乐、舞蹈)为主要内容;《礼》掌于宗伯,以民俗、法制为主要内容,也包括古代科技的一些史料;《易》掌于太卜,以神学和哲学为主要内容;《书》和《春秋》掌于史官,以上古史和当时的近现代史为主要内容。^① 作为华夏文明原创性经典,《诗》、《书》、《礼》、《易》、《乐》的雏形产生于西周王官,是“王官之学”的通用教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先秦诸子对之认同尊崇,纷纷以它们作为典籍教材研习并传授弟子,“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传播者是孔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史记》中记载:“孔子闵王道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主张的“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实行的“不分国族”颠覆了“官学世守”的意识。为了将学术

^① 董运庭:《论“六经”的经典化过程》,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8页。

教育普及,他必须选取适应的教材。在精心选择后,孔子精编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古书,进而奠定了儒家早期经典的基本内容。

“六经皆史”,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了五帝至夏商周三代,氏族部落林立的历史。既有“商颂”,又有“周颂”、“鲁颂”、“大雅”、“小雅”,包含了姜嫄履帝武敏而生后稷,古公亶父于周原兴邦,文王、武王建都丰镐等历史。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

《书》具有上古之书的蕴意,是上古誓、诰、命、谟等纪言的历史文献。它来源于历代史官中“左史记言”之所得,内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记载了唐尧、虞舜、夏禹、商契、周公以来史事。相传《书》有三千多篇,孔子从中选择出一百篇,并作了编次、整理和阐释。

《礼》、《乐》保存了许多战国以前宗教礼仪、典章制度、乐舞旋律方面的宝贵资料。孔子曾到杞国去求访夏礼,到宋国去访求殷礼,他对夏、商、周三代的“礼”进行了比较,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乐”起源于原始宗教活动,其乐曲到后来便存于“诗”、“礼”之中。在祭祀或庆典活动时,按节而舞是为乐,依拍而歌便成诗,诗、乐、歌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不同的礼仪。^①

《易》本是古代占筮之书,始于伏羲时代的画卦,它记载了原始的

① 江林昌:《“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载《孔子研究》2006年第4期,第68页。

宗教文化。夏、商、周三代均有《易》书，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易》的兴趣不在占筮，而是通过占卜推演“德义”。在他的努力下，《易》由宗教巫术的占卜之书变为一部道德、政治、哲学之书，《易》的辩证思维原理，得以突显。

《春秋》记录了鲁国的史料，“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作《春秋》前，使子夏求周之《史记》，得百二十国之宝书，其后所编写的《春秋》与之前各国所作《春秋》有较大不同，它的目的已不是交通人神，从事宗教活动，而具有了明显的政治目的，“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经孔子整理过的“六经”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史料价值，更在随后的讲解过程中，注入了新的时代要素，让其向着世俗的、理性的、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儒学文化不断转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之“六经”的面貌。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传播“六经”时，将哲学的理论思辨赋予其中，大大扩大了文本的内涵，典型的代表是《易传》的出现。《易传》即《彖》、《系辞》、《象》、《说卦》、《文言》等，共十篇，称为“十翼”，其用哲学语言对《周易》的内容作了新的解释，从而使《周易》从原来的占筮之书变成为哲学之著作。

然而，“六经”等典籍出现后并非立即成为“经典”，它们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经典化过程。众所周知，“六经”本不称“经”，它们先是被称为“书”，继而称为“典”，最后才得到“经”的称谓。“书”的本义是

“著”，“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释名·释书契》）。“书”的用途更多的是一种记载。后来，人们将记载帝王言行的“书”专称为“典”。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典”是指“五帝之书”。当“典”传至春秋战国之际时，孔子挑选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为课本来教授弟子。由于“六经”文献影响深远，于是后来的儒者便把这几部“典”作为本学派最为重要的著作，尊奉为“经”，以求显赫于世与其他学派竞争。实际上，先秦诸学派，各有自己的“经”。如墨家《墨子》有《经上》、《经下》篇，医书有《难经》、《内经》，道家有《道德经》等，只不过儒家是以文献为“经”，其他家以本学派创始人的著作为“经”罢了。

当然，“六经”成“经”绝非称谓改变这么简单，它还经历了意义的符号化过程。孔子对每部经典意义的归结是：“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郭店楚简中也记载：“《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性自命出》）《荀子·儒效》中也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显然，“六经”在儒家学者的视域里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体系，从中可获得天地之理，人生价值、行为规范等均包含其中，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被极大地扩展。

孔子确定“六经”后，“六经”的学说不断被后来儒者“引经据典”。《孟子》引《诗》、《书》，强调法先王；《荀子·劝学》中有“《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的说法。在《论语》、郭店楚简儒家简、《礼记》等文献中，引用“六经”的情况普遍存在。事实上，儒家学者已经把“六经”当做是知

识与价值的源泉,是常习常用之道,既是解析明理的依据,又是为自我学说、观念、论说寻求合理性的根据。《荀子·劝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六经”是儒家学习活动中必须诵习的一种书。“六经”正是在不断被传承、背诵、阅读、引用中获得了类似于“信仰”的地位,其权威性也在此流程中日益加深,甚至尽管儒家思想不断进步和发展,但其形式却一次次表现为向原典“六经”的“返本开新”,恰如《释名·释典艺》所言:“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还有一个原因必须提及,那就是在“六经”传承中文本意义的演绎性。孔子对于“六经”的删定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体现了解释学的效应。其在日后的思想传播中始终贯彻“六经”本身不是僵化教条的理念,使人相信就义理而言,“经”的意义表述不是直接的,而是象征性、启示性的,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同时,“经”自身有着言简意赅的特点,为后人留下无限的理解、诠释的空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周易·系辞传》)因为语言的局限性,经典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是难以穷尽的,所以理解、诠释主体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对经典文本加以解释。此外,孔子的言行和学术也在其传授“六经”时成为儒家新的“传述”对象,进而成为“经”的一部分。“六经”与孔子言论一道成为儒家学问、规范和价值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儒家思想家们越来越相信“经”的意义指向深远,他们的论著亦大多成为对“经”的传述和阐述,随之出现了“传”、“记”等新的词条。“六经”被“对象化”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解经方式被“对象化”了,而且具备了多向解释和演绎的可能性,甚至存在反向解释和演绎的可能性。至此,一门新的学说——“儒家解释学”诞生了。

四、儒家解释学的内容体例

儒家解释学的内容体例可分为经、传、记、章句、序、笺注、义疏、考据、校注、评注等多种形式。上文中已经谈及,儒家的“经”是经典,是儒家学者对上古文献精心选取、整理所得,后又加入对孔孟等圣贤言论的记录。儒家认为“经”是天地之常,“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篇》)。所以,它的解释体例强调对原文的梳理,对“原意”的呈现。

孔子及其后学以经作为课本教育学生,其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经文,而是让“经”中蕴涵的道理、意义得以彰显,学习“经”可培育出学生的理想的人格智慧。因而,对“经”的解说就成为一门必然的功夫,“传”的体例形式出现了。“传”即是对“经”的解说,它还有“说”、“记”等称谓,不过总的都可以称为“传”。自先秦起,儒家出现了大量“传”,“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如《易》、《书》的“大传”,《礼》、《乐》的“记”,《诗》的鲁、齐、韩、毛四家之“传”,《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等。而记载了孔孟解经言行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传”,在唐宋“四书升格”运动后,甚至得到了“经”的受尊崇地位。

“传”体例出现对于儒家解释学发展的意义在于:第一,“传”使得儒家思想与解释学的理论体系得以确立。通过“传”的阐释,上古的文献成为儒家学说得以立足的根本,儒家的思维模式、解释理念成为一个系统,得以确立。第二,因为“传”的存在,“经”有了“备王道”的意义,如《春秋》本是鲁国的大事记,但由于有了《公羊传》、《穀梁传》,其成为了一部政治伦理学著作。客观上,这让儒家思想与社会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达成了一致,为儒家解释学获得“官学”地位提供了便利条